

青少年文化反哺：重新审视家庭 场域内的交流与教育

——青少年家庭内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的量化考察

万丽慧 刘 杰 文 璇

摘 要：文章通过对湖南省株洲市渌口镇 233 个青少年家庭的问卷调查，发现青少年家庭内接入沟层次、使用沟层次、知识沟层次及总的数字代沟分别与其对应的反哺程度成负相关关系；文化反哺的增强能使得亲子交流增加并有效改善家庭关系，弥合数字代沟；文化反哺对家庭场域内传统教育方式造成冲击，子代高层次的媒介素养教育因此缺位。研究提出父母在被反哺的同时应寻找与子女的共鸣点，加强正向哺育，在新媒体的协作下帮助子代完成社会化进程。

关键词：青少年；数字代沟；数字鸿沟；文化反哺；新媒体

作者简介：万丽慧，女，副教授，文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漳州，363000）

刘杰，男，本科生。（闽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漳州，363000）

文璇，女，本科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统计与数学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8）03-0045-08

马克·普连斯基于 2001 年用“数字原生代”和“数字移民”的概念以表征当代人与其前人在数字化技术方面的巨大差异。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涌入家庭生活后使得代际间本来固结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断裂，而代际断裂的突出表征正是“数字移民”和“数字原生代”两代人的分界。^[1]数字媒体技术的革新不断地改变着家庭场域内的生活，而青少年接受新兴媒体的能力与意愿显著强于其父母，由此便产生出一条显著的“数字代际沟”横跨在亲代与子代之间^①。

新媒体的使用在拉大亲子间代际差异的同时，也悄然无声地挑战并改变了家庭固有的文化传承模式。从古至今，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亲代拥有对子代的绝对教化能力，年长者拥有毋庸置疑的知识优势。而新媒体的出现质疑、改变了这种由上至下的文化传承模式。进入数字时代后，亲子两代由于对社会急速变迁的适应能力不同，导致了对新事物的理解与学习的快慢也不同，子代获得的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正逐步瓦解亲代绝对的教化权力。

一、文献回顾

（一）数字鸿沟与数字代沟

数字鸿沟的概念自 1995 年提出后得到了学界广泛的讨论。最开始指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社会和人口特征群体因为一系列的不平等而导致的信息接入、接触和使用的差异，^[2]如今主要指基于互联网的新兴数字技术在扩散和普及方面的不均衡现象。^[3]数字鸿沟自提出后开始朝着两种研究方向发展，一是宏

基金项目：本文系福建省 2016 年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6B191）的阶段性成果。

① 本研究中的亲代为样本家庭中父亲或母亲中的一位，子代为儿子或女儿中的一位。

观地将其分为全球鸿沟、社会鸿沟与民主鸿沟，一是较为微观地将其分为接入鸿沟、使用鸿沟与知识鸿沟，本文中探讨的是微观上的研究。接入沟体现了拥有者和匮乏者之间的差距，使用沟关注的是因个体差异而体现在使用媒介与操作技能上的差距，二者因接入和使用新媒体的差异必定会导致获取知识的鸿沟。^[4]

代沟是“由于时代与环境的急剧变化、现代化进程的发生、社会的不断转型，而导致不同代之间在价值观念、行为取向、文化喜好选择方面出现的差异、隔阂”。^[5]从代际的视野对数字鸿沟进行研究，则为数字代沟，具体表现为两个群体“数字读写能力”差异的结构性分类标准。^[6]

（二）文化反哺

文化反哺一般认为是从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的传递和承接。但这种法则及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自近代以来却逐渐面临挑战。^[7]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急速变迁，各类新事物纷纷涌入人们的生活视野。年轻一代的开放思想使他们能快速吸收新兴事物，而他们的父辈对此则表现得较为吃力。

周晓虹教授从1988年起开始关注并不断考察文化反哺这种新的文化传播范式，他将其定义为“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8]，其理论研究源自于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中提出的“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指的是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一直是由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进行文化传承，帮助青少年完成“社会化”。而与之对应的“后喻文化”则表现为反向文化传承，在差异、隔阂乃至冲突面前，父母需要反过来向子女学习以完成新一轮的“再社会化”。

二、研究问题与设计

（一）研究问题

文化反哺与数字鸿沟理论从提出伊始就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在经过理论探讨其影响与作用后，学界将视角从客观经验范式转向与诠释经验范式相结合，对文化反哺与数字鸿沟进行组合研究。有在大、中、小城市等观念较为开放的地区进行的实证调研，也有在农村较为封闭甚至落后地区进行的质化考察，但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城镇这种处于中间地带区域的并不多，更未见有研究将数字代沟及文化反哺的深度和程度分层次进行具体量化，从而在时间维度上对其发展态势进行研究，并考察其相互作用情况以及对家庭关系、教育产生的影响的。

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的全貌与已有结论的适用性，我们决定选取生活在湖南省株洲市渌口镇这个在各方面均处于平均水平的城镇中的青少年家庭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限制与使用条件。

《渌口镇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年表》显示渌口镇人口构成情况为65后：70后：75后：80后的人群总数接近3：3：3：2，男女比例接近1：1，我们基于此比例对275个青少年家庭进行问卷发放，最后回收到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有效数据233份。问卷共分五个部分：（1）亲代与子代的基本信息；（2）接入代沟及该层次上的反哺情况；（3）使用代沟及该层次上的反哺情况；（4）知识代沟及该层次上的反哺情况；（5）家庭关系变化及社会效应（亲代卷为“再社会化”情况，子代卷为媒介素养情况）。出生年份不同的亲代会在不同的媒介环境下成长、工作与生活，由媒介环境培养出来的“数字本能”也不同，具体表现为接受、使用媒介和利用不同媒介获取文化知识的能力。这种本能在以书籍、报纸、广播和电视盛行的大众传媒时期并没有变现出显著差异，而过渡到新媒体时代，“数字本能”则影响着家庭两代人之间的数字代沟和文化反哺。

根据中国互联网中心（CNNIC）2017年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而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几乎所有网民人手一部手机。本次调查显示结果与其一致,在调查样本的亲代与子代中,“智能手机”的普及率最高(89.7%),且最多地被认知为自己使用频率最高的新媒体设备。智能手机作为移动互联网的代表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对其使用日渐熟悉后,亲代与子代因个体的差异使得关注的点面不同,手机的普及与知沟研究带来的结果可能相同:即数字鸿沟的趋势是增大而非渐小。对新媒体使用的愈加熟练使得亲代日渐脱离要子代的反授,能更自主地操作使用。因此本研究做如下假设:

假设1,随着亲代出生年份的增大(年龄逐渐减小),亲代与子代间接入沟层次、使用沟层次、知识沟层次及总的数字代沟的深度逐大。

假设2,随着亲代出生年份的增大(年龄逐渐减小),亲代与子代间接入沟层次、使用沟层次、知识沟层次及总的文化反哺的程度逐小。

(二) 研究设计

1. 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统计的基本信息除了包括亲代与子代出生年份、性别外,还包括了大量应用于测量个体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的几项指标,即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收入。^[9]代表家庭基本信息的八个变量均可近似看作连续变量。而计量出的三个层次及总的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均为有序分类变量且近似连续变量。因此,在研究中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与ANOVA三种分析方法对变量进行分析。

2. 量化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

已有学者构建了城乡之间数字鸿沟的测度指标体系,^[10]但针对同一场域内鸿沟的测量未有规范的标准。在这次探索性研究中,我们设计了三种问题来分别测量三个层次及总的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

(1) 对问题提供的选项按照使用频率进行排序。已有研究已经充分证明子代与亲代在数字代沟的三个层次上均有显著差异性。为避免重复证明,把问题的答案设计为分类且排序的选项,以排序为标准设定分值,排序第一的分值最高,第二次之,以此类推。以家庭为单位,根据亲代与子代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对应地可以计算出亲代与子代相应的分值,亲代与子代在同一问题上的分值之差即为量化后的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

(2) 李克特量表。测量反哺程度时我们借助“李克特量表”设计问题选项测量出亲代与子代对该问题的态度,如“如果您不太了解新媒体设备上的新技术时,子女是否建议您学习使用?”我们对选项从“强烈建议”到“从不建议”按5至1进行赋分。在计算时我们取双方分值的平均值来避免亲代与子代对同一问题由于认知差异、记忆不全等原因造成的主观误差。而量化某一变量有若干问题时,我们赋予不同问题不同权重来计算。

我们对问卷中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制定的问题进行了信度与效度的检验。信度检验采用了Cronbach's α 系数作为检验指标评价相应调查项目内部的一致性。分析项目为3,亲代与子代层面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737和0.703,信度评价均为好。信度是效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KMO检验统计里(Kaiser-Meyer-Olkin)是用于比较变量间简单相关关系和偏相关系数的指数,其取值在0至1之间。亲代KMO取样适度量测量值为0.563,亲代KMO取样适度量测量值为0.581,亲代与子代的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显著性均为0.000。因此,本问卷中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的部分的信度与效度均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3) 多项选择式问题。在难以排序或用量表测量的问题上,如“请从以下选项中选出您熟悉的网络流行语”与“您最经常通过新媒体浏览哪些方面的知识”等,我们则统计亲代与子代分别选择了哪些选项后,通过并集减去交集来计算。

三、研究发现与思考

（一）文化反哺与数字代沟成负相关

经过数据的整理、计算，我们得到青少年家庭样本中三个层次及总的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的深度及程度。在控制了除亲代年龄外的其他变量后，我们分别做出了 8 个变量随亲代年龄变化的图像，并分类整理制作了四个折线图（见下列图 1—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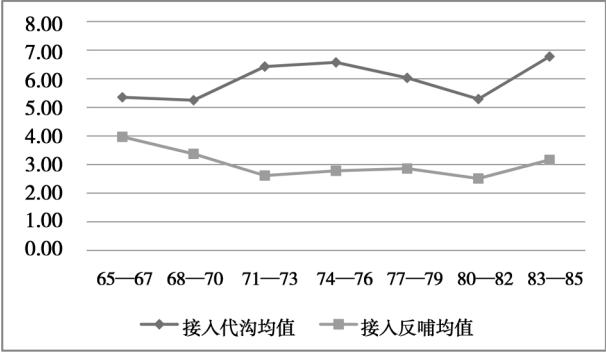


图 1 接入代沟与接入反哺随亲代出生年份变化折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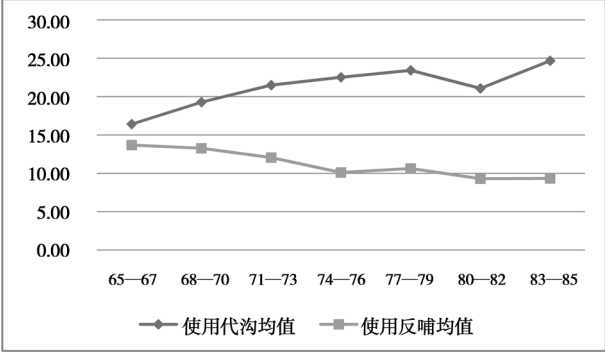


图 2 使用代沟与使用反哺随亲代出生年份变化折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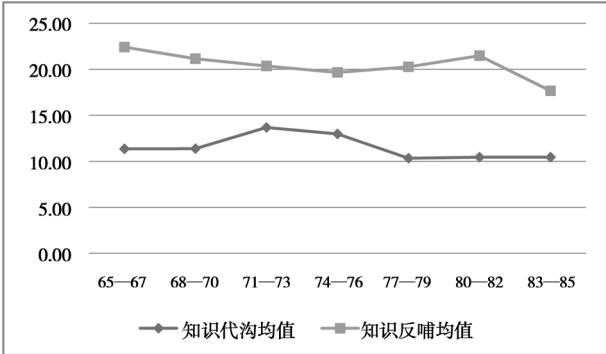


图 3 知识代沟与知识反哺随亲代出生年份变化折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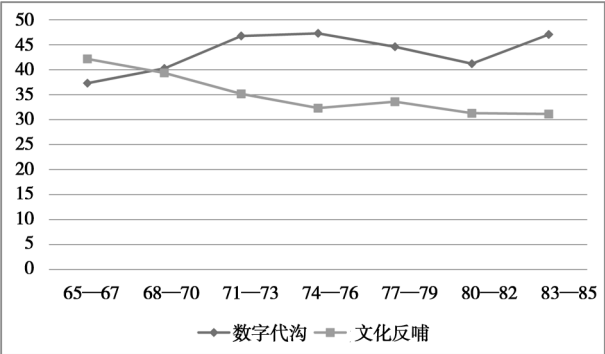


图 4 数字代沟和文化反哺随亲代出生年份变化折线图

从以上四幅图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个层次的数字代沟的深度分别与其对应的反哺程度随着亲代出生年份的增大呈反向发展，即成负相关：代沟增大，反哺减弱。相关分析表明亲代出生年份与使用代沟（ $r=0.220$ ， $P=0.001$ ）、使用代沟反哺（ $r=-0.358$ ， $P=0.000$ ）的关系最为密切（如图 2）。

数字代沟的深度与文化反哺的程度则随着青少年家庭内亲代年龄的变化呈不稳定波动，三个层次上数字代沟、文化反哺的相互作用分别使总的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随时间成周期发展，分别呈现为正、反“S 型曲线模式”，总体表现为上升趋势与下降趋势。

表 1 亲代出生年份与文化反哺、数字代沟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误差	Beta		
文化反哺	-.331	.064	-.320	-5.133	.000
数字代沟	.227	.153	.097	1.481	.140

线性回归结果显示（见表 1），假设 2 得到支持（ $B=-0.320$ ， $p<0.000$ ），即随着亲代年龄的逐渐减小，青少年家庭内的文化反哺程度逐小。这很明显地与亲代由媒介环境培养的“数字本能”联系在一起，出生年份越大的亲代在成长、工作期间所获取的各种有利条件与知识背景，都使得他们更为积

极地采纳、使用新媒体。而越乐于接受与使用新媒体，他们掌握的技能也越多，需要子女反向哺育的情况则越少。而数字代沟有明显的三段变化：

一是前上升阶段。亲代与子代因成长时处于不同的媒体环境，对于各种新媒体的接受与使用的差异及学习能力导致了二者之间的数字代沟。子代对数字信息与媒介的敏感性和把握能力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亲代掌握的相关知识与能力则有限，并不能如同子代一样顺畅地使用新媒介。从四个折线图中也可以看出在进入第二阶段之前，图1、图2、图3中代沟曲线均随亲代出生年份的增大而上升，三层因素的作用不断拉大親子间的代际差异，进而导致总的数字代沟拉大。

二是下降阶段。当最开始那一批处于优势地位的青少年成为亲代后，同样由于在成长、工作期间所获取的各种有利条件与知识背景，在新媒体出现后能迅速接入、使用并利用新媒体获得新的知识，親子差距缩小，代沟也随之减小。而这种差距的缩小呈现清晰的先后顺序，图3知识代沟曲线中显示为从“71—73”开始下降，图1中接入代沟曲线显示为从“74—76”开始下降，图2使用代沟曲线中显示为从“77—79”开始下降。不同层次的代沟从不同出生年份的亲代开始变化，随着亲代年龄减小，最先缩小的是知识代沟。

三是再上升阶段。接入代沟、使用代沟与数字代沟曲线中均出现“80—82”现象，即此时曲线下降到了谷底（如图1、2、4），而图3中知识代沟曲线的变化则提前到“77—79”。80后青年的子代基本都是小学或初中在读，他们对新媒体的使用受到父母、时间、金钱的制约。子代出生年份与使用代沟反哺（ $r = -0.350$, $P = 0.000$ ）成负相关，年龄较小的子代，他们还处于接受亲代教育的阶段，反哺能力也较弱，“数字独立性”^①也不强。且调查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80后青年的子代并未拥有属于自己的手机、电脑或其他新媒体设备，根本不具备先决条件，于是代沟增大。而随着80后青年的年龄增大，子代年龄也增大，子代的“数字独立性”与反哺能力增强，曲线呈现再次上升，且有更迭趋势。

虽然假设1没有得到验证（ $B = 0.097$, $p > 0.005$ ），但依然可以从图中看出其总体趋势为增大。而四个折线图中代沟的曲线呈不稳定波动也证实了前文的猜想：新媒体的普及并未缩小数字代沟，而呈扩大之势。在图3中知识代沟曲线在“77—85”阶段呈平稳状态，出生年份在此之后的亲代与其子代的知识差距可能出现逐渐稳定的趋势。在家庭场域内由新媒体冲击带来的客观差距趋弱，而剩下的親子知识差距则重回主观或经验上的差距。

（二）增强交流、改善关系：文化反哺作用下数字代沟的弥合

1. 家庭场域内数字代沟越大，文化反哺越弱

我们设置了相关问题来考察家庭关系的变化。在我们的数据中，家庭关系为有序分类且近似连续的变量，具体表现为冲突越大的家庭分值越低，越和谐的家庭分值越高。经过分析数据，我们发现家庭关系的变化与文化反哺的各个层次均呈正相关，从整体上反映为反哺程度越高，越能促进親子关系的和谐与发展。三个反哺层次对亲子关系变化的影响程度排序为：使用代沟反哺 > 知识代沟反哺 > 接入代沟反哺。更有趣的是使用代沟反哺越强的青少年家庭内相应的接入代沟反哺也越强（ $r = 0.337$, $P = 0.000$ ），使用代沟反哺越强的青少年家庭内相应的知识代沟反哺亦越强（ $r = 0.203$, $P = 0.001$ ），即反哺现象一旦出现，并不会只存在于某一领域，而是会逐渐蔓延、扩散到其他领域。

表面上看反授对父母在新媒体的使用与知识的掌握方面影响较大，但其内在逻辑却是親子间交流的加强改善了亲子关系。文化反哺最强大的作用不仅在于帮助父母“再社会化”，更是为親子交流提供

① “数字独立性”意指独立使用新媒体并获得知识的能力。

宝贵的契机（33.6%），交流使得关系改善（21.0%）。而“增加了冲突、分歧”（5.2%）却大多源于父母对青少年使用新媒体的管制。

结合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成负相关的情况来考虑，当亲子间固有的代际差距已经较大，会导致双方话题减少以至于出现“无话可说”的情况，此时只有当父母需要并主动请教的时候反向哺育才会出现，而此时的反哺仅局限于接入代沟反哺与使用代沟反哺的基础层次。而亲子的代际差距较小时，可供交流的话题更多，双方间讨论也更多，反哺现象才更容易出现，反哺过程本身也在交流场中进行。此时，亲子之间的交流不仅局限于基础层次的反哺，还会在使用、知识层次的反哺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父母从子女身上学习到的新知识、新观念使得两代人能更好地互相理解。反哺使得亲子差距再次减少，为共同话题的增加提供契机，以此不断呈现良性循环，数字代沟得以弥合。

麦克卢汉认为真正有意义的讯息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及带来的社会变革。新媒介技术会赋予青少年不同于以往的价值观、思考方法和认知行为方式。而身为“数字移民”的父母未必能理解这样的讯息，这可能就是代沟引起的家庭矛盾的根本来源。

2. 文化反哺有弥合亲子间数字代沟的可能

由代沟引起的冲突是许多中国青少年家庭面临的巨大挑战，本研究中关于文化反哺程度的变化与数字代沟深度的变化成反比的发现，证明了“文化反哺”极有可能会带来数字代沟的减弱，成为缓和代际隔阂的有效途径^[11]的结论。我们应该抓住“只此一地，只此一次”的难得机遇，年轻一代应加强与年长一代的互动，在充分尊重年长一代的同时，细心细致、不遗余力地传递自己所掌握的新知识。社会要为文化反哺营造氛围、提供条件、搭建平台。^[12]而搭建文化反哺平台就是构建家庭内亲子交流的契机，产生矛盾和相互理解都是交流的功效。矛盾的暴露能提醒家庭成员亲子关系的问题所在，为矛盾的有效缓和提供条件，使家庭关系向相互理解的和谐关系发展。

（三）文化反哺对家庭场域教育的冲击

1. 学校场域对文化反哺的影响大

学校与家庭两个场域的教育对青少年的影响历来最大。“青少年受教育程度”考察的是来自学校场域的情况。本研究经过ANOVA分析显示（见表2），子代受教育程度与接入代沟反哺、使用代沟、使用代沟反哺、知识代沟等均显著相关，且经过进一步相关分析得出其与使用代沟反哺的相关程度最大。教育的增加不仅能拓宽青少年的知识视野，使他们得心应手地使用新媒体，而且还会影响其反授父母的程度。由此表明，学校场域教育的作用显著。接入代沟和知识代沟反哺则与统计的任何家庭基本信息均无关系，也有可能是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表2 子代受教育程度为自变量的分析数据

自变量	统计方法	统计值	显著性
接入代沟反哺	ANOVA	F=4.049	P=0.002
使用代沟	ANOVA	F=7.546	P=0.000
	相关分析	r=-0.280	P=0.000
使用代沟反哺	ANOVA	F=7.254	P=0.000
	相关分析	r=0.390	P=0.000
知识代沟	ANOVA	F=8.564	P=0.000
	相关分析	r=0.276	P=0.000

2. 家庭场域内的教育力量减弱

学校场域内的教育多关注于学业知识，而家庭场域则向来承担了包括媒介素养等大部分“社会化”教育。新媒体介入生活后，青少年更习惯于向网络寻找知识、寻求帮助进行自主学习，却质疑父母的经验教育。家庭场域的教育似乎随着文化反哺机制下青少年地位的提升而逐渐趋弱。张开教授将媒介素养归纳为“知识模式”、“理解模式”、“能力模式”三种模式。“知识模式”即人们所建立的获得正确媒介信息、信息产生的意义和独立判断信息价值的知识结构，以及认知媒介如何对社会产生功能的知识体系。“理解模式”即理解媒介信息在制造、生产和传递的过程中受到来自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技术的诸力量的强制作用，它侧重于对信息的判断和理解力。“能力模式”则侧重对信息的认知过程，指人们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13]

本次研究调查数据显示，样本青少年中最常见的影响是“了解了更多的知识，拓宽了视野”（60.7%），其次是“运用从网上学到的知识技能让生活变得更好”（37.4%）、“促进我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34.2%）。而仅有14.2%的青少年“能创造和传播自创的信息内容”、9.8%的青少年会“思考文化产品背后的深意”，最高层次的媒介素养的不足引人深思。但也许这仅是潜在威胁的冰山一角。

文化传承功能中的文化不单仅指文化知识的传承，更多的是泛指群体中包括社会角色、社会规则、风俗习惯等一切行为方式的综合传承。赖特将这种功能称为“社会化”。文化反哺这种互动模式无疑激发了子代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力量，也提高了他们的自信、能力与见识。^[14]而刘宏森教授对此进行了批判性思考，认为不宜放大青年“文化反哺”的影响力，更不能把“文化反哺”视为对人的正向社会化过程的否定。^[15]青少年可以从新媒体场域的教育中获取一定的知识，但这种教育不足以帮助青少年完成社会化，也不能够代替家庭场域的教育。

3. 知识正哺与知识反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知识代沟正哺与知识代沟反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r=0.615$ ， $P=0.000$ ），即知识代沟正哺越强的家庭，知识代沟反哺也越强，这充分说明样本中青少年家庭内子代与亲代间关于获取知识的交流是双向的，子女主动与父母讨论得越多，父母向子女传授知识也会更积极，反之亦然。积极搭建文化反哺的平台不仅可以增强亲子交流，还可以加强父母对青少年的正向哺育。

家庭场域内的教育在新媒体环境下受到冲击是现实也是必然。文化反哺只是这种冲击的开始。但在这场冲击下父母不应该一味将“哺育”权利让渡给青少年，而是应该通过亲子间的新媒体互动、文化反哺、文化正哺，在子代对自己进行反哺时能抓住机会，对他们进行一定的媒介素养教育，使得他们能正确地看待、辨别互联网上的知识，增强社会经验、社会责任感与信息选择、过滤能力，从而以批判性思维正确地运用这一工具提高生活质量，避免陷入盲目追求现实利益及娱乐至死的陷阱，进而帮助子代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四、结 语

本研究发现在样本青少年家庭中，各个层次及总的数字代沟分别与其对应的反哺程度成负相关关系，而且随着亲代年龄的减小，代际间三个层次以及总的文化反哺程度逐小。家庭场域内数字代沟越大，文化反哺越弱，亲子间的话题越少。增强文化反哺成了弥合数字代沟的契机。文化反哺表面上看是子女对父母的反授，但实际反映的是亲子间的交流关系，通过增加谈论话题，亲子关系得以有效弥合。研究发现样本青少年受教育程度与多个层次的文化反哺、数字代沟呈显著相关关系，表明学校场

域的教育明显。而文化反哺冲击家庭场域内传统教育方式后,子代的高层媒介素养教育明显缺位引人深思。研究还发现知识反哺与知识正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文化反哺平台的积极搭建不仅可以构建家庭内亲子交流的契机,还可以加强父母对青少年的正向哺育。父母在被反哺的同时应适当夺回教育权利,通过寻找与子女的共鸣加强正向哺育,加强代际文化传承,从而帮助青少年完成“社会化”进程。

由于条件所限,本研究采集的数据仅为截面数据,也缺乏质化数据的佐证。若能够对青少年家庭样本进行连续、深入考察,结果会更有说服力。如研究发现亲代与子代性别的差异会导致接入代沟反哺程度的改变,但是亲代与子代性别的差异是如何直接影响接入代沟反哺,我们的数据不能提供相关的证明。希望今后对本文结论进行检验与讨论的学者能规避和完善以上不足。

参考文献:

- [1] 周晓虹.文化反哺与媒介影响的代际差异[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2):63-70.
- [2] Willis, S. &Tranter, B. Beyond the “digital divide”: Internet diffusion and inequality in Australia.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6, 42(1): 43-59.
- [3] 朱秀凌.青少年的手机使用、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J].新闻界,2015(11):47-53.
- [4] 韦路,张明新.第三道数字鸿沟:互联网上的知识代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4):43-54.
- [5] 周怡.代沟现象的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4(4):67-79.
- [6] William J. Egnatoff. Tapscott, D. (1988). Growing up digital: the rise of the net gener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1999, 4(2): 203-205.
- [7] 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J].社会学研究,2000(2):51-66.
- [8] 周晓虹.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J].青年研究,1988(11):22-26.
- [9] 郑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就业——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3):111-118.
- [10] 刘骏,薛伟贤.中国城乡数字鸿沟的测度[J].统计与决策,2014(14):48-50.
- [11] 弓丽娜.现代社会中的青年文化反哺现象探析[J].道德与文明,2004(4):68-72.
- [12] 李学勇,林伯海.代际和谐视野下的文化反哺[J].思想教育研究,2014(10):44-47.
- [13] 张开.媒介素养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97.
- [14] 周晓虹.从颠覆、成长走向共生与契合——文化反哺的代际影响与社会意义[J].河北学刊,2015(3):104-110.
- [15] 刘宏森.反哺与哺育——对青年“文化反哺”的质疑[J].探索与争鸣,2013(7):34-37.

[责任编辑:詹小路]